

# 戴望舒在香港

## 第二章

### 一九四二——一九四五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香港度過一個著名的黑色聖誕日。十二月二十五日下午，日本的先頭部隊到達了中環的「香港酒店」①，香港政府已樹起白旗，戴望舒與多數的香港市民一般，無可避免面臨「在醉後那些形同禽獸的士兵便四出搶掠、強姦和殺人」的恐怖時刻②。他服務的《星島日報》也停刊了，這段日子，他怎樣度過，沒有文字記錄。但在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底，到一九四二年春天，却有三百多名文化界知名人士，例如鄒韜奮、戈寶權、茅盾、胡愈之、胡繩、金仲華、于伶、宋之的、葉以羣、廖沫沙、胡仲持等，在中共黨中央指令下，受到東江縱隊的保護，離開香港，安全抵達後方③，為什麼？三百多人中，沒有戴望舒，這真是一個謎。因為論知名度，論抗日熱誠，甚至論與左翼關係，他不該不在搶救名單內④。日後，

徐遲說他是「捨不了他的藏書」⑤，孫源說他「因各種原因一時走不了」⑥，無論什麼原因，戴望舒就是這樣不幸地留在香港了。

### 入獄

那一首著名的《獄中題壁》，刻畫了詩人在日本人牢獄中⑦的不屈精神和對勝利的盼望，但他什麼時候入獄？在獄中多久？也缺乏可靠的資料。

日人攻陷香港，很快就把留港的各界知名華人，逐一逮捕審問，有些經審問後就釋放了，有些審訊了仍囚牢中。戴望舒在一九四二年春天被捕，孫源據朋友的傳說，有下列的記錄：

「望舒那天去看望原任香港大學中文學院教授的馬鑑，馬先生是……住在香港大學附近半山腰的一座洋房裏。望舒從馬家出門後，就下坡到一家舊書店裏去看看，不知道自己從馬家出來時已被

日方特務釘上了。他一走出書店門，就有兩個特務靠攏來，威脅他說：『戴先生，請你跟我们走一遭。』就這樣，他被逮捕入牢獄。」⑧

但據戴望舒的《回憶》⑨，他是「在雅各理髮室被捕，同時被捕的除黃魯外，另有潘姓青年，被捕後囚在奧卑利監獄內。」在受審期間，相信不免受到嚴刑，例如「放飛機」⑩，敵人可能因他在文藝界的地位，詢問了他許多抗日作家的資料，據端木蕻良憶述馬鑑的回憶時說：

「望舒被傳詢，敵置黑名單於側，要彼相認。望舒知余已離港去久，又念發表我的文章甚夥，如云不識，難令置信。遂漫應之：與端木相識。因此入獄。」⑪

由此可知，如果他當時能夠「合作」一些，也不必受牢獄之災。給囚禁了一段日子，經葉靈鳳設法，托人把他自獄中保釋出來⑫。可是，獄中生活，把如牛健的他，弄得虛弱，哮喘病狀也更深了。

## 出獄·婚姻

他什麼時候出獄？看來不會遲過一九四二年的五月。出獄後，住在葉靈鳳家裏，爲了生活，就在隸屬日本文化部的「大同圖書印務局」工作<sup>⑬</sup>。應該也就在此時，他與獄中難友黃魯及一個叫萬揚的人，合股在利源東街十號，開設了一間舊書店，名字「懷舊齋」<sup>⑭</sup>。他們每人出了一百元軍票作資本，由黃魯擔任店務主持，戴望舒向一個姓沈的朋友買了千多二千本書，加上各人自藏而用不着的書，就開起店來了。戴望舒日常幹些什麼呢？據黃魯回憶：

「望舒又是外省人，買賣間語言諸多不便，不過，望舒却時常在店裏幫忙，比如抄錄新購進的書目，定價與及計算賬目等」。<sup>⑮</sup>可是，書生作買賣，第一個月還賺點錢，到了第四個月已經無法再支持下去，僅僅維持了四個月的「懷舊齋」，就因不善經營關門大吉了<sup>⑯</sup>。

戴望舒這個時候，正忍受敵人的凌辱，和妻子遠離的寂寞歲月，他的苦悶，恐怕只有老朋友葉靈鳳最清楚：

「在香港淪陷期間那幾年苦難的日子，他雖然始終興緻很好，強顏歡笑，但我知道他的內心是淒苦的」。<sup>⑰</sup>

在這段苦悶時光中，他除了流連在永吉街、鴨巴甸街的幾檔舊書攤，買入許多善本絕版書外，也許，真的難耐寂寞，就在一九四二年五月三十日，跟他小二十一歲

的楊靜結了婚<sup>⑱</sup>。當時只有十六歲的楊靜，並不知道這時候戴望舒並未正式與前妻穆麗娟離婚<sup>⑲</sup>，而她也承認：

「那時候，我年紀太小，對他的瞭解不多，也沒有想到要好好的了解他。現在看來，可以說是一種遺憾。」<sup>⑳</sup>

「兩個生活方式不同的人」<sup>㉑</sup>在戰火患難中結合，雖然令詩人寫下了這樣的詩句，

「不如寂寞地過一世，

受着你光彩的薰沐，

一旦爲後人說起時，

但叫人說往昔某人最幸福。」<sup>㉒</sup>

但到頭來，這段不如意的婚姻，徒添了詩人的煩惱。

## 工作

文藝界，歷來是敵人或統治者攻入一地後，最先控制的領域之一，因爲文藝既繫人心志又易影響羣衆思想，也最能表現統治者的「文明態度」。日本的「香港佔領地總督部報道部」最早就控制了本港各大報館，在督導之下，一九四二年六月，全港華文報紙共有五家：《香港日報》（戰前已有日文版，日人資本。）《星島日報》（利用《星島日報》器材資源出版。）《華僑日報》（是本港原有大報。）《南華日報》（是汪派機關報，戰前已出版。）《東亞晚報》（是淪陷時期唯一的晚報。）在日人控制下，均得以宣揚「大東亞共榮圈」及「聖戰」爲目的。但負責的主編，特別是文藝副刊的編輯，多採取「

只談風月」或較「中立」的態度編報。不涉及政治時事，多談文藝及推介外國作品，仍是淪陷時期，香港報刊的文藝版特色<sup>㉓</sup>。

一向從事文化活動的文化人，此時爲了生活——部份可能被迫，部份可能甘心附敵，幾乎必然仍做着編輯或寫稿的工作，戴望舒和葉靈鳳，都是在三年零八個月的敵治時期，似以編輯寫稿謀生的人。據所知戴望舒負責過三個日報的副刊

（一）一九四四年一月三十日創刊的《華僑日報》，《文藝周刊》。這副刊的出現，除了「許多文藝愛好者所呼喊的一樣：兩年以來，南國文藝園地實在太荒蕪了」<sup>㉔</sup>外，相信最主要的是想借助這一塊園地，等待：

「燕子來了的時候，他自會將我們的消息帶給海外的友人，帶給遠方的故國」<sup>㉕</sup>。

可惜，這副刊一共出版了七十二期，就因「報社不允提高編費稿酬，不得已廢刊」<sup>㉖</sup>了。葉靈鳳戴望舒都是副刊的編輯，從七十二期的內容看來，風格很像戴望舒編的《星島日報》的《星辰》及《俗文學》兩版的混合。在刊中，他的譯作及詩作佔的份量很多，可以看出他是全力以赴的。

（二）《香港日報》，《香港文藝》。這張戰前由日人辦的報紙，因戰火停刊的時間很短，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已經復刊<sup>㉗</sup>。據陳君葆先生回憶，在一九四四年左右，戴望舒曾主編

該報一個文藝副刊，但忘却叫什麼名字<sup>28</sup>。而戰後「港粵文協」<sup>29</sup>資料室提供的《敵佔期間香港文化活動》<sup>30</sup>，就提及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三十日至一九四五年七月五日的《香港日報》副刊《香港文藝》，共三十二期，其中經常撰稿人名單中，有戴望舒的名字。相信陳君葆先生提及的就是這個文藝副刊，可惜香港大學孔安道圖書館只藏一九四二年六月十日至一九四三年六月三十日的《香港日報》，故無從評價戴望舒這項編輯工作。

(一九四五年七月一日創刊的《香島日報》，《日曜文藝》。這個副刊是由葉靈鳳及戴望舒為首的《華僑日報》，《文藝周刊》作者羣，轉來撰稿支持的，所以兩刊的風格面貌並沒有多大分別。該刊只出至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六日，即第九號，便隨着日本向盟軍投降，香港重光而結束了，它也成為戴望舒在淪陷時期，最後一項編輯工作。

除了編輯副刊外，戴望舒還給幾個刊物譯寫外國文藝作品，也間有創作。譯稿多刊在《香島日報》的《綜合》版。此外，《新東亞》、《香島月報》、《大眾周報》，都常見他的文字<sup>31</sup>。但最特別的，應是他在《大眾周報》寫的《廣東俗語圖解》。這個專欄由一九四三年四月三日直至一九四四年十月十九日，不斷刊出，共八十一篇。他用「達士」作筆名，並由陳第（鄭家鎮）繪圖。據說戴望舒的上海口音還脫不掉，一個外省人來解釋廣東俗語

，好像很「外行」，其實看過這些文字，就明白他把廣東俗語當成俗文學來研究。文中廣引古書筆記，加上廣東民間傳說及風俗資料，給廣東俗語來源合理的解釋，並不是信口雌黃的遊戲之作。這八十一篇文章，本來已列為《大眾周報叢書》之一，在一九四五年五月「均已付排，不日即出」<sup>32</sup>，但相信此書並沒有正式面世，因為同年八月，日本就戰敗投降了。此外，他為《南方文叢》第一輯寫過：《詩人梵樂希逝世》及《對山居讀書雜記》<sup>33</sup>，也為《香島月報》總編輯盧夢殊（羅拔高）的《山城雨景》寫過一篇跋<sup>34</sup>，但這些文章，均成為日後留港粵文藝作家聯名檢舉他附敵的證據<sup>35</sup>。

### 抗日民謠的創作

身陷敵人手中的知識分子，又是知名人士，既無法一死殉國，却又難逃羅網，他們能做些什麼？像戴望舒，戰前在香港的文藝活動，大部份都以宣傳抗日為主，香港失守，就落在敵人牢裏，等到放出來，還是得生活下去，而敵人自然也不輕易放過他，要好好利用一下他在文藝界的聲望，收一點影響人心的宣傳效果。於是，許多人就稱他「附敵」、「落水」了。但從資料看，很容易看出有些人忍辱偷生，利用機會發揮抗日作用，筆下仍有自己立場，與那些處處逢迎敵人、動筆就無恥稱許「大東亞共榮精神」的文人，分別實在很大。

戴望舒在幾家報館裏擔任編輯工作，

譯寫了許多東西，但文中未見片言隻字討好日本人。偶然給拉去看電影，參加「試映座談會」，座中也只說些無關宏旨的話<sup>36</sup>。雖然，他曾擔任了「香港佔領地總督部成立二周年紀念」徵文的「新選員會」委員<sup>37</sup>，也是一九四五年八月三日成立的「香港文化聯誼社」發起人之一<sup>38</sup>，但這恐怕都不是出於自願。

究竟敏感而愛國的詩人，在這種困境裏還能用什麼行動來表示內心的悲憤和抗日情緒呢？當然，他渴望重過跟朋友「遊山，玩水，談心，／喝杯咖啡，抽一枝煙，／唸唸詩，坐上大半天？」的日子，也希望與家人「燒個好菜，看本電影，／回來圍爐談笑到更深」的時光，但他也明白，那必須「送敵人入殮」，「將敵人殺盡」，「自由和幸福才會臨降」<sup>39</sup>。在盟軍飛機來炸的時候，他知道「也許我們會碎骨粉身」，同時也深信「苦難的歲月不會再遲延，／解放的好日子就快到」<sup>40</sup>。這些詩都不能在當時發表，但詩人有一組歌謠，却在當時就暗中在民間流傳，這恐怕不是許多人知道的事。

日本人攻佔香港以後，爲了祀奉「在中日事變以至大東亞戰爭中陣亡英靈」，決定在港島金馬倫山西方高地，興建一座「忠靈塔」。不但向民間募捐經費，還大量抽調民伕協助興建工作，一九四二年十一月展開第一期工程，就在這時候，民間暗暗流傳着這樣一首民歌：

「忠靈塔、忠靈塔，今年造，明年折。」

另外，還有咒罵日本的「神風飛機」的：

「神風，神風，  
隻隻升空，落水送終。」  
也有兩首打擊敵人信心的：

「玉碎，玉碎，  
那裏有死鬼，  
俘虜一隊隊，  
老婆給人睡。」

「大東亞，  
啊呀呀，  
空口說白話，  
句句假。」

以上四首倖存的戰時反日民謠，據說作者就是戴望舒。我說「倖存」，是因為依照常理，這種反日民謠本不會公開作者姓名，而且只靠口耳相傳，和平後，很容易給人淡忘了。一九四六年十一月，有一個叫朱儒的人，在《新民報》中，刊出一篇香港忠靈塔的文章，提到這些民謠作者是戴望舒。朱儒的文章我沒有看到，只在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十八日的《華商報》《熱風》版中，看到馬凡陀的《香港的戰時民謠》，文中說：

「據香港朋友的證實，這首民謠的確是戴先生寫的。而且當時寫的民謠不只這一首，共有十餘首之多，因為他們單純易懂，富於民謠的特色，立刻為香港民間所接受而流傳了。環境使他不得不隱去作者的姓名，……曉得是戴望舒寫的，則難得一二人而已。」

這些抗日民謠作者是不是戴望舒，一時間

沒有更多有力證據，而「難得的一二人」是誰？年代已久，茫茫世間，恐怕也難尋到。但有一點值得注意的是：一九四六年一月開始，留港粵文藝作家二十一人，聯名向「中華全國文藝協會重慶總會」檢舉戴望舒附敵，一九四六年春天，戴望舒回到上海，據說就是為了向「中華全國文藝協會」解釋交代自己在香港淪陷期間的情況<sup>④①</sup>。這篇由馬凡陀寫的「文聯社特稿」<sup>④②</sup>，刊在《華商報》上，從時間上看，大可明白左翼文藝界——特別是黨中央，基本已接納「作者是戴望舒」的說法。不知道目前還有沒有人能記起這件事，記起其餘的抗日民謠？如果能找到這些有力的證據，對戴望舒的研究，應有很大的幫助。

### 小結

三年零八個月的蒙污生活，詩人仍堅持地說：

「讓我在這裏等待，  
耐心地等你們回來；  
做你們的耳目，我曾經生活，  
做你們的心，我永遠不屈服。」<sup>④③</sup>

他經了折磨和考驗，他用「戰鬥的呼號」代替了「個人的低聲的哀歎」<sup>④④</sup>，詩風的改變，是這個時期戴望舒最重要的「收穫」。好容易盼得勝利的日子來臨，但勝利並沒有給他帶來好運，除了一身病困外，他還得為衣食奔走，為家事而煩惱，為洗脫自己的污玷而努力，這真是他一生的悲劇。

一九八五年二月二十五日 完稿

注釋：

① 薩空了：《香港淪陷日記》，一九四六年四月，香港進修出版教育社初版，頁58—59。該書封面與版權頁所列書名不同，版權頁書名為《香港淪陷回憶》。該書為作者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至一九四二年一月二十五日的日記，對這段日子香港文化人活動、避難情況、社會狀況、報界活動及物價民生，均有詳細記述，為香港淪陷後首一個月，保留了極重要參考資料。

② 李樹芬：《恐怖的三日》，《香港外科醫生》，一九六五年一月，李樹芬醫學基金出版，頁一〇九—一一三。

③ 有關東江縱隊保護留港文化人撤退詳情，可參考：

茅盾：《脫險雜記》，一九八〇年一月，香港時代圖書有限公司出版，頁一九五—三二。

王作堯：《緊急搶救》，《東縱一葉》，一九八三年六月，廣東人民出版社出版，頁一六一—一七一。

魯鋒、羅汝中：《威震港九》，《東江星火》（下），一九七九年九月，深圳市委宣傳部編，頁七—八。

④ 王作堯：《緊急搶救》一文中，可見此次「搶救」，是黨中央的指示，有了詳細計劃，才分頭行動。

⑤ 據徐遲先生一九八三年二月十二日口述資料。

⑥ 孫源：《回憶詩人戴望舒》，《海洋文藝》七卷六期，一九八〇年六月十日，頁三十八—四

⑦ 戴望舒曾入獄，應毫無疑問，直至目前，只有鄭家鎮在《我認識的戴望舒》一文（見《香港文學》第二期），說：「葉靈鳳曾陷黑獄，戴望舒倖免於難。」

⑧ 同⑥。

⑨ 據一九八〇年十月三十日，施蟄存先生手抄《戴望舒回憶》片段，但施先生對該文件的真實

性，存保留態度。

⑩同⑨。這另有一旁證，戴望舒曾用「白銜」一名寫《幽居識小錄之一——讀水滸傳之一得》（《大眾週報》一卷二期，一九四三年四月十日，頁十。）文中對「盆吊」這一刑罰及「拼扒」式逮捕，利用《水滸傳》引文作了詳細解釋，相信也是有感而發。

⑪端木蕻良：《五四懷舊詞》，《文滙報》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九日，版十二。

⑫同⑨。

⑬「大同圖書印務局」本是胡文虎及何東二人合資經營，但受日本文化局管治，先後出版了《大同畫報》、《新東亞月刊》及一些叢書。葉靈鳳、張光宇、張正宇均曾在此局任職。但據胡漢輝在《四十年後話中新》（見《歷史·話舊·懷念——香港中國新聞學院紀念文集》，一九八四年二月二十八日，廣州香港中國新聞學院校友會籌備會出版，頁五十三—五十五。）文中提及葉靈鳳是「利用他在日本文化局所屬大岡（盧按：應作「岡」，原文誤作「岡」）公司工作方便，暗中挑選來自東京的各種書報雜誌」交胡漢輝做敵後工作。由此可知他們為了生活，在此局工作，但並不是真心附敵。

⑭黎明起：《回憶望舒》，《華僑日報》，《文藝》雙周刊，一二七期，一九五〇年四月十日，四張一頁。

黎明起是廣州詩人黃魯所用筆名。

⑮同⑭。

⑯在《大眾週報》一卷一期，一九四三年四月，頁九，仍見「懷舊齋」的廣告，不知道此時老闆是誰。

⑰葉靈鳳：《望舒和災難的歲月》，《文藝世紀》，一九五七年八月號，一九五七年八月一日，頁八一—九。

⑱據楊靜女士一九八四年五月五日口述資料。

⑲據一九八三年九月二十九日，施蟄存先生抄錄戴望舒日記二則「一九四二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致穆麗娟第五十五函，同意離婚。」及「一九四三年一月二十六日，寄穆麗娟第五十六函，附寄離婚契約。」

⑳公孫樹：《與楊靜女士談戴望舒的愛和死》，《南北極》一一〇期，一九七九年七月十六日，頁十九—二十一。

㉑卞之琳：《悼望舒》，《華僑日報》，《文藝》雙周刊，一二七期，一九五〇年四月十日，四版一頁。

㉒《贈內》，《華僑日報》，《文藝周刊》，三十三期，一九四四年九月十日。該詩後收入《災難的歲月》，頁八十一—八十二。詩末註「一九四四年六月九日」。

㉓到了一九四五年，日人為了粉飾太平及腐蝕人心，出版了如《廣東人報》、《人報》、《香城》等小報，則以庸俗路線為主了。

㉔《給讀者》，《華僑日報》，《文藝周刊》第一期，一九四四年一月三十日，版二。

㉕同⑭。

㉖《啟事》，《香島日報》，《日曜文藝》，創刊號，一九四五年七月一日。

㉗薩空了：《香港淪陷日記》，頁六十八，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日記。

㉘據陳君葆先生一九七九年十月六日口述資料。「港粵文協」是「中華全國文藝協會香港分會」的前身，關於這分會戰後的組織及變革，也跟戴望舒有關，詳見下章。

㉙文協資料室《敵佔期間香港文化活動》，《正報》，四十六期，一九四六年三月一日，版三。

㉚詳見《戴望舒在香港的著作譯作目錄》，《香港文學》第二期，一九八五年二月五日，頁二十六—二十九。

㉛《南方出版社新書預告》，《時事週報》第四號，一九四五年五月十四日，封底。

㉜《文藝綜合叢刊：南方文叢本期內容》，《時事週報》第十七號，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三日，

封底。

㉝該書內容曾於《華僑日報》，《華嶽》連載，一九四四年九月一日初版，香港華僑日報社出版部發行。

㉞《留港粵文藝作家為檢舉戴望舒附敵向中華全國文藝協會重慶總會建議書》，《文藝生活》光復刊二期，一九四六年二月一日，封底內頁。

㉟《文藝陣地》復刊二號，同時刊出。

㊱《日本名片《歡樂家庭》試映座談會》，《大眾週報》，一卷二期，一九四三年四月八日，頁十四。

㊲見⑮，引錄一九四四年一月二十八日《東亞晚報》的啟事。

㊳見⑮，該社沒有什麼實際活動，又因同年八月底，香港光復，故該社徒具不到一月的「歷史」。

㊴《心願》，發表於一九四六年一月五日，《新生日報》，《新語》，題為《願望》。後收入《災難的歲月》，詩末註：「一九四三年一月二十八日」。

㊵《口號》，發表及出版同《心願》，後收入《災難的歲月》，詩末註：「一九四五年一月十六日香港大轟炸中」。香港淪陷時期，盟軍飛機常來轟炸，最嚴重兩次，一次是一九四五年一月十五、十六日，轟炸目標為中區，另一次是一九四五年一月二十一日，轟炸目標是灣仔。

㊶據施蟄存先生一九八一年十二月九日來信提供資料。有關這件「回國交代」事，詳見下章。

㊷《香港的戰時民謠》一文文末註：「文聯社特稿」。

㊸《等待》其二：收《災難的歲月》，頁五十八—六十二。詩末註「一九四四年一月十八日」。

㊹艾青：《望舒的詩——〈戴望舒詩集〉序》，《戴望舒詩集》，一九八一年一月，四川人民出版社，頁一—十。